

胡仔及《苕溪渔隐丛话》历代版本

沈 乃 文

一

苕溪渔隐,是南宋文人胡仔的别号。胡仔,字元任,籍贯是徽州绩溪,生于大观四年(1110),作过三几年下层官吏,行实平淡,记载很少,后代的说道也不多,惟有他编撰的北宋后期诗词评论总集——《苕溪渔隐丛话》(下简称“丛话”),一直流传到今天。

苕溪在绩溪东北三百里外的湖州。湖州是个好地方,南宋时临近行在,溪山清幽,又是鱼米之乡。当年周密在《癸辛杂识》前集中说:“吴兴山水清远,升平日士大夫多居之,其俊秀安禧,王府第在焉,尤为盛观。丽城中二溪水横贯,此天下之所无,故好事者多园池之胜。”二溪水即苕溪和霅溪,传说苕溪以夹岸多苕花而得名。嘉泰间谈钥撰《吴兴志》,于卷五云:苕溪一源发自湖州西南之天目山,一源发自东南之独松岭,又并入浮玉山水;二源北流,汇合于丘渡,再往东北入湖州城,涌入霅溪而下太湖。

胡仔于“丛话”前集卷五十五云,“余卜居苕溪”,“临流有屋数椽”,当是住在溪边。然而苕溪很长,前集卷五十九又云:“贾耘老旧有水阁,在苕溪之上,景物清旷。东坡作守时屡过之,题诗画竹于壁间,沈会宗又为赋小词。”“其后水阁屡易主,今已摧毁久矣。遗址正与余水阁相近,同在一岸,景物悉如会宗之词。故余尝有鄙句云:‘三间水阁贾耘老,一曲清词沈会宗。无限当时好风月,如今总属绩溪翁。’”贾收(字耘老)是北宋中期的诗人、隐士,与苏轼要好,家有“浮辉阁”、“怀苏亭”。据周密《齐东野语》记载,贾氏水阁在城南横塘上。那么,胡仔的居所当亦在横塘。

横塘景物幽胜,贾收自咏:“洄洄流水抱横塘,兰芷无风也自香。”胡仔所述苏轼于元丰二年知湖州时所吟“过贾收水阁”诗曰:“爱酒陶元亮,能诗张志和。青山来水槛,白雨满渔蓑。汨垢添丁面,贫低举案娥。不知何所乐,竟昔独酣歌。袅袅风蒲乱,猗猗水行长。小舟浮鹅绿,大杓泻鹅黄。得意诗酒社,终身鱼稻香。乐哉无一事,何处不清凉。”沈会宗所赋“天仙子”词曰:“景物因人成胜概,满目更无尘可碍,等闲帘帕小阑干。衣未解,心先快,明月春风如有待。谁

信门前车马隘，别是人间闲世界，坐中无物不清凉。山一带，水一派，流水白云长自在。”从中俱可体味当时当地自得其乐的氛围。胡仔也“时有鄙句”，于前集卷五十五“聊举其一二云”：“卷起纶竿撒棹归，短篷斜掩宿渔矶。日高春睡无人唤，撩乱杨花绕梦飞。”意趣闲适，透出一派幽独隐遁之情。胡仔甫辞世，淳熙间湖州教授周世南撰《吴兴志旧编》，录存于《吴兴志》卷十七中，简介胡仔是“少无宦情”，仅“留心吟咏”。然而胡仔真的是这样的人吗？

胡仔与岳飞、陆游同时代。当时的大宋山河破碎，偏安半壁，处于金军的南侵威胁之下。为首的绍兴朝三十二年，在南宋一百五十二年历史中时间最长，高宗对金屈辱称臣，纳贡银绢，避战求和，不惜冤杀岳飞，奠定了南宋的政治基调。兼以秦桧柄国，援拔党徒，倾陷异己，以至政事日非，志士蹉跎。南渡文人忧国伤时，多悲壮苍凉之作。然而胡仔的文字却不及时事，他出身官宦之家，又候选出仕，却与家人隐居；他受儒学教育，读书广博，却只醉心诗词，鉴赏的眼光还不低；他寄情山水，优游吟咏，却家境困窘，壮年时即自叹衰老。如此等等，多少异于通常的想象，不免让后人费解。

胡仔自作“满江红”词：“泛宅浮家何处好，苕溪清境。占云山万迭，烟波千顷。茶灶笔床浑不用，雪蓑月笛偏相称。争不教二纪赋归来，甘幽屏。红尘事，谁能省？青霞志，方高引。任家风舴艋，生涯零簪。三尺鲈鱼真好脍，一瓢春酒宜闲饮。问此时，怀抱向谁论？惟箕颍。”（“丛话”前集卷五十五）上古许由坚辞尧的禅让和任命，遁耕于中岳箕山之下，颍水之阳。然而是什么样的红尘事，致使胡仔要引志青霞，仿效许由呢？

绍兴时的显谟阁学士汪藻，曾为湖州、徽州知府，又是胡仔的外祖，撰有“朝散郎致仕胡君（胡仔祖父胡咸）墓志铭”（《浮溪文粹》卷十三），谓胡仔高祖之上“皆乐里居，不求仕进”，至曾祖胡策始为铅山尉。虽然叔祖胡宏中过进士，作过处州司法参军，但是祖父胡咸游太学十馀年，最后谢病回乡。直到胡仔的父辈，方得跻身官宦家族之中。父亲胡舜陟（1083-1143），字汝明，号三山老人，大观三年（1109）进士，靖康间为侍御史；建炎间任庐州知府、淮西安抚使、制置使、建康知府、两浙宣抚司参谋官、临安知府；绍兴间任江州知府、庐州寿州宣抚使、淮西安抚使、广州知府、静江知府兼广西经略安抚使，算得上是两宋之交的名臣。二叔胡舜申，字汝嘉，官至朝议大夫、舒州通判。四叔胡舜举，字汝士，建炎二年（1128）进士，官至南剑知州、光禄大夫。再到胡仔本人荫补迪功郎，官闽中漕幕。三弟胡傅，字元辅，荫补承务郎、朝奉郎等。四弟胡仰，字元高，荫补承务郎，历大理寺正、提点荆湖南路刑狱公事，至朝散郎、直秘阁、提点两浙东路刑狱公事。此时胡家的家运也就不可避免地有时政所牵连。

胡仔一直追随父亲，舜陟屡建文武之功，竟然未得善终。《新安文献志》云：绍兴元年（1131）舜陟因丁父忧，奉诏夺服乘驿赴行在，以徽猷阁待制知临安府故职宣谕京淮湖北，由于与时相议论不合而谢归。时相即为建炎四年（1130）十月方自金营回到越州，是年八月作右相的秦桧。次年秦桧被罢免，六

年又复出,八年复相位,十二年为太师。而舜陟于二年起复,六年以徽猷阁学士知静江府兼广西经略安抚史,八年被免职。《胡氏家谱》记载,舜陟尝劾奸相秦桧十余条,桧深恨之,讽御史中丞常同举奏,以至罢归。十年再起,复静江知府兼广西经略。《宋史》卷三百七十八舜陟小传云:舜陟曾劾转运副使吕源沮讨郴贼军事。十三年吕源以书抵秦桧,讼舜陟受金盗马,非訕朝政。桧素恶舜陟,入其说。舜陟被逮下狱,居两旬,辞不服,死于狱中。夫人汪氏诉冤于朝,诏究其实。复奏谓舜陟受金盗马事涉暧昧,其得人心,虽古循吏无以过之。方回《桐江集》卷七“渔隐丛话考”称舜陟“死于静江府狱中,实秦桧杀之也”,因其为“文臣之善用兵者也,桧之杀之殆以此”。

然而情事还有曲折,《宋史》卷三百九十九高登小传云:十二年时舜陟因所辖古城县为秦桧之父旧治,故在当地建桧父祠,并撰记文以媚桧,还欲逮治反对此事的县令高登。这与上述舜陟为桧所恶之说抵牾不合,因而清末胡培翬等撰《胡少师年谱》,谓舜陟建祠一事,有高登后代枉说之疑。今考方回晚舜陟百余年,其说似出自郑钢中《北山集》卷十四“祭胡宣抚文”,文述舜陟乃“一时英特之士,兼资文武之才,上所贵重以为宝者也”。后代之所以屡屡引据方说,是因为当时处置舜陟一案,必经秦桧点头。而《宋史》虽然有芜杂之评,但是关于舜陟既献媚于秦桧,又死于其手的记载,看似违背简单的逻辑,却或许恰恰正是史实。

父亲死时胡仔年方三十三岁,从他“问此时,怀抱向谁论”的心曲中,不难体会父亲的结局对他的影响之深。自此他隐居苕溪,诗词成为精神的寄托。

二

胡仔于后世的诸种小传,尽皆寥寥。综合各类记载,其本末大致如下:

十二岁宣和三年(1122)前,在绩溪老家。

胡宗楙《金华经籍志》卷二十四“丛话”条著录:“宋永康胡仔元任纂集”。所记乡籍显然不对,当是谬以胡仔为北宋端拱进士加兵部侍郎衔致仕的永康人胡则的后代而致误。莫伯骥《五十万卷楼藏书目录初编》卷二十二云:“考明正统间江西张懋丞撰‘苕溪渔隐图序’云:‘浙东胡元任,以苕溪渔隐图名天下。’又云:‘元任讳仔,兵部侍郎则之重孙。’是仔为永康人,啗有明徵。”亦属同误。

十二岁至二十岁一直逃难,从徽州逃到湖州。

宣和二年方腊反于睦州,三年其一部攻绩溪,胡家屋宇一夕煨烬,骨肉惊散。于是阖家北渡,投奔时任泗州教授的胡舜申。“丛话”前集卷五十四曰:“余宣和间居泗上。”胡舜申《乙巳泗州录》云:“宣和乙巳(七年,1125)予家寓居泗州之教授厅。”

靖康二年,也即建炎元年(1127),金军分三路第三次南下攻宋,宗辅、宗弼率东路,取道山东趋淮南。十八岁的胡仔随家逃至湖州,《乙巳泗州录》曰:

“是年秋，……闻太原失守，知淮泗不可居，借船于发运方孟卿，遂得亲来湖州。”复自湖州随胡舜陟至金陵、平江。建炎二年宗翰率金军中路与东路会合，三年径取扬州行在。宗弼更孤军深入，突破江宁、杭州、越州、明州，四年乘舟入海，追击高宗三百馀里，三月方撤兵北返。胡家再逃回湖州，胡舜申《己酉避乱录》云：三年时，先有旨，令守平江。虏人自广德县安吉往钱塘渡江，破明州、越州，假道平江北还。吾家船留江口，老小系道，弟舜举、侄仔径走吴兴。惟予与令人侍家君朝散，同舜陟等登舟至垂山，张帆顺流而下，老幼皆安然至吴兴。始见弟、侄，已抵吴兴旬日矣。

二十一岁至三十四岁，陪父亲东奔西走。

其间，二十二岁绍兴元年（1131）时，祖父胡咸八十一岁卒于湖州，葬于安吉县管城之原，舜陟丁父忧三年。此时胡仔已经荫补，汪藻“朝散郎致仕胡君墓志铭”云：“仔亦迪功郎。”从九品。

二十七岁绍兴六年，侍父舜陟赴官桂林，得知《诗总》一书。

二十九岁绍兴八年，侍父舜陟自静江罢归祠禄，作《孔子编年》。

“丛话”后集卷三十九云：“先君尝丐祠，居射村。”射村在湖州归安县城西南四十里。舜陟甫归，即命胡仔采摭经传，编撰《孔子编年》，成书五卷。清代《四库全书总目》卷五十七评论：“是书辑录孔子言行，以《论语》、《春秋》三传、《礼记》、《家语》、《史记》诸家所载，按岁编排，体例亦如年谱。”“自周秦之间，讖纬杂出，一切鬼异神怪之说，率托诸孔子，大抵诞漫不足信。仔独依据经传，考寻事实。大旨以《论语》为主，而附以他书。其采掇颇为审慎，惟诸书记录圣言，不能尽载其岁月。仔既限以编年，不免时有牵合。”“然由宋迄元明，集圣迹者，其书日多，亦猥杂日甚。仔所论次，犹为近古。故录冠传记之首，以见滥觞所自云。”

三十一岁绍兴十年，再次侍父舜陟赴桂林复职。

在前后两度往返桂林期间，曾多次游历湘中。“丛话”前集卷四十七云：“余顷岁往来湘中，屡游浯溪，徘徊磨崖碑下，读诸贤留题，惟鲁直、文潜二诗，杰句伟论，殆为绝唱，后来难复措词矣。”

三十四岁绍兴十三年，舜陟六十一岁死于静江狱中。

当年承旨赐葬湖州射村，改地名为胡家坞，遣官致祭。郑刚中“祭胡宣抚文”述当时场景：“總帳之间，泣者呱呱，阿郎可怜，而幼女仅离于抱。”

三十五岁至四十岁，一直在湖州，编撰“丛话”前集六十卷。

绍兴十八年作“丛话”前集序言云：“绍兴丙辰（六年）余侍亲赴官岭右。……后十三年，余居苕水。”

四十二岁绍兴二十一年后，在钱塘开馆授徒。

“丛话”前集卷五十四云：“余宣和间居泗上，……后三十年于钱塘与张仲宗同馆穀。”

五十三岁绍兴三十二年，至闽中为漕幕，且常去建阳北苑观造贡茶。

“丛话”前集卷四十六云：“壬午之春，余赴官闽中漕幕。”漕幕为福建路转运司属官，为官三年。前集卷十二云：“余官建安，因事至北苑焙茶。”

五十六岁乾道元年（1165），复归苕溪。

“丛话”后集卷三十三云：“乙酉岁，余归苕溪上。”

后集卷十六云：“丙戌（乾道二年）之冬，余初病起，深居简出，终日曝背晴檐，万事不到，自以荆公所选唐百家诗，反复熟味之。”“集中佳句，世所称道者，不复录出。惟余别所喜者，命儿辈笔之，以备遗忘。”

五十八岁乾道三年，续编“丛话”后集四十卷完稿。

乾道九年胡仰印行了《孔子编年》。史浩《鄮峰真隐漫录》卷三十六“跋胡元高父撰宣圣编年”云：“乾道癸巳余为福州京西漕使，胡君仰遣价求跋于某，始知此书乃其先君子作，于是敬述前语以遗之。”史浩于乾道四年五年任绍兴知府，胡仰乾道间任职浙东提刑司，有同地为官之谊，故胡求史跋。然而《孔子编年》杀青已三十五年，胡仔应该是六十四岁，史跋不仅不提胡仔，且行文谓书为其父作，标题又谓书为胡仰作，混乱已极。估计胡仔此时已经去世，行年当在六十至六十三岁之间。

综上，周世南所谓胡仔“少无宦情”，不过是遮掩其长年闲废的曲笔。胡仔在“丛话”前集卷五十一等处宣称：“余性乐闲退，一丘一壑，盖将老焉。”也不过是借放浪林泉，来转化内心的不平；而后集卷二十七谓：“余连蹇选调四十年，在官之日少，投闲之日多，固能知静坐之味矣。”才是真话。胡仔甚至不容居官者混迹江湖，前集卷二十八记韩玉汝谪死前题诗“君恩未报身何有，且寄扁舟梦想中”，即予申斥：“江湖之景，天付闲人。今诸公居宰辅，享富贵如此，又欲兼有江湖之乐，贪而不止，世间岂有扬州鹤邪？”

胡仔晚年为闽中漕幕，大概是一生中惟一的出仕，也是候选近三十年的结果。《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九十五“丛话”条，谓胡仔“以荫授迪功郎、两浙转运使干办公事转奉议郎、知常州晋陵县”。嗣后几乎所有的胡仔履历，如清代《胡少师年谱》、1979年中华书局版《宋诗话考》、1999年台北“中央图书馆”《善本书志初稿》的“渔隐丛话”条，均予抄引。然而所谓两浙转运使干办公事，当为福建路转运使干办公事。所谓知常州晋陵县，今查《常州府志》所载宋代晋陵的知县、县丞等，均无仔名，颇可置疑。《五十万卷楼藏书目录初编》卷二十二云：“胡氏（胡宗楙）又谓元任官至临江知府，均足补馆臣之所不及。”临江于宋淳化三年（992）为军，元改为路，至明洪武初年方改为府，知府之说显系谬传。1965年中华书局版《全宋词》，谓胡仔“宣和间，官建安主簿”，也是无据之谈。

湖州本地和流寓的贵富宅园甚多。《癸辛杂识》前集记录当地私家园林达二、三十处。谈钥《吴兴志》记载胡仔水阁所在的“横塘面南山之胜，对南溪之流，自郡户口蕃盛，土族渐多，增土为园池”，“今大半为亭馆沼沚矣”。但是有关园宅的记载中没有胡家。

湖州又是藏书之乡,《齐东野语》记载:“吾乡故家如石林叶氏、贺氏,皆号藏书之多至十万卷。其后齐斋倪氏、月河莫氏、竹斋沈氏、程氏,皆号藏书之富,各不下数万卷。”胡仔于“丛话”后集卷十称“学者欲博读异书”,前集卷十一以史传证少陵诗事,连引《穆天子传》等十八书,可见其读书之多,然而藏书家中亦无胡氏。

相反,胡仔一家生活困窘。“丛话”前集卷四自叙:“渊明有云:‘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缸无储粟,生生所资,未见其术。’三复此语,真余之实录也。余投闲二十载,生事素微,食指既众,家日益贫。退之诗云:‘时命虽乖心转壮,技能虚富家逾窘。’亦似为余发,时时哦之,不觉失笑。余尝有诗云:‘壮图鹏翼九万里,末路羊肠百八盘。’盖言老而多艰耳。”

胡仔是有儿辈的,但是全无记载,未知是否因艰于生计,而皆非读书人了。

三

胡仔好诗受到父亲影响,“丛话”前集卷十三云:“先君平日,尤喜作诗,手校老杜集,所正舛误甚多,句法暮年深得其意味。”家庭的变故和自身的经历,也导致他将精力兴趣尽付于诗词。但是引发胡仔编撰“丛话”的,是阮阅所编的《诗总》。

胡仔在前集序言中自述:“绍兴丙辰,余侍亲赴官岭右。道过湘中,闻舒城阮阅昔为郴江守,尝编《诗总》,颇为详备。行役匆匆,不暇从知识间借观。后十三年,余居苕水,友生洪庆远、从宗子彦章,获传此集,余取读之。盖阮因《古今诗话》,附以诸家小说,分门增广,独元祐以来诸公诗话不载焉。考阮编此《诗总》,乃宣和癸卯,是时元祐文章禁而弗用,故阮因以略之。余今遂取元祐以来诸公诗话,及史传小说所载事实,可以发明诗句及增益见闻者,纂为一集。凡《诗总》所有,此不复纂集,庶免重复。或一诗而二三其说者,则类次为一,间为折衷之。又因以余旧所闻见,为说以附益之。”漏说的,是其父三山老人的见解也附益其中。

胡仔于绍兴十九年所见的《诗总》,分为十卷四十六门,已经失传。今存《诗话总龟》一书,胡仔当年也曾寓目。“丛话”后集卷三十六云:“闽中近时刊行《诗话总龟》,即舒城阮阅所编《诗总》也。余家有此集,今‘总龟’不载(阮阅)此序。”随后录存的阮序,落款为宣和五年(1123),当是《诗总》的成书时间。前集卷十一记述:“阮字闳休,官至中大夫,尝作监司郡守,庐州舒城人。其《诗总》十卷,分门編集。今乃为人易其旧序,去其姓名,略加以苏黄门诗说,更号曰《诗话总龟》,以欺世盗名耳。”今本《诗话总龟》前集仍分四十六门,当除少量增补外,尚是《诗总》的原始;而后集五十卷,则以“丛话”、《碧溪诗话》、《韵语阳秋》杂凑而成。方回“渔隐丛话考”谓:“总龟”乃“合古今诗话,添诸家之说,标‘益都褚斗南仁杰纂集’,前、后、续、别七十卷,麻沙书坊捏合本也”。此“前、后、续、别七十卷”本,显非胡仔所见仅“略加以苏黄门诗说”本。

而今传九十八卷明嘉靖刊本,后集包含“丛话”后集内容,缪荃孙因而谓之不可解,更非胡仔所见本。所以,受到方回指斥的绍定二年(1229)书坊本的“华阳逸老序”、卷端所题的“益都褚斗南仁杰纂集”,未必尽系伪托,或是增补改编者的自署。

“丛话”前集的完成时间,通常认为即自序落款的“戊辰(绍兴十八年,1148)三月上巳日”。然而前集卷五十四有“余宣和间居泗上,……后三十年于钱塘与张仲宗同馆穀”一条。胡仔居泗上始于宣和三年,后三十年则当在绍兴二十一年及随后的几年间,方是前集的完成时间。换句话说,序言是先写成的,至少又拖了三年方最后完稿。胡仔于序末感叹:“今老矣,日以废亡。此集之作,聊自备观览而已,匪敢传之当世君子,故不愧焉。”年方三十九岁,心境如此颓唐,良可叹也。

过了十数年后的乾道三年,胡仔又完成了“丛话”后集四十卷,再序:“余丁年罹于忧患,投闲二十载,杜门却扫于苕溪之上,心无所事。因网罗元祐以来群贤诗话,纂为六十卷,自谓已略尽矣。比官闽中,及归苕溪,又获数书。其间多评诗句,不忍弃之,遂再采摭,因而捃收群书。旧有遗者,及就余闻见有继得者,各附益之,厘为四十卷。噫,前后集共一百卷,亦可谓富矣!”续编的目的是“诗道迩来几熄,时所罕尚。余独拳拳于此者,惜其将坠,欲以扶持其万一也”。复叹:“嗟,余老矣,命益蹇,身益闲,故得以编次。终日明窗净几,目披手抄,诚心好之,遂忘其劳。盖穷人事业,止于如斯,虽有覆瓿之讥,亦何恤焉。”五十八岁臻于老境,不老的,是心中对于诗词的热情。

《诗总》与“丛话”之间,存在传承关系,但是二者体例不同。《诗总》是按诗的事类分门编排,“丛话”是按诗的作者分人编排。胡仔于前集序言自述:“谓余不能分门纂集,如阮之《诗总》,是未知诗之旨矣。”“余今但以年代人物之先后次第纂集,则古今诗话,不待检寻,已粲然毕陈于前,顾不佳哉。”同时,《诗总》专录小家,排比异说,多采小说家言,较少考证。“丛话”则着眼大家,辅之以类相从,颇多考辨议论,重点在于李、杜、苏、黄四家。后集序云:“余尝谓开元之李、杜,元祐之苏、黄,皆集诗之大成者。故群贤于此四公,尤多品藻,盖欲发扬其旨趣,俾后来观诗者,虽未染指,固已能知其味之美矣。”四家之中,首重杜甫。前集卷九评价:“老杜于诗学,世以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前集卷十四云:“余纂集丛话,盖以子美之诗为宗。凡诸公之说,悉以采摭,仍存标目,各志所出。今更拾遗,类次为一,以便观览焉。”次重苏轼,前集评杜达十三卷,评苏则达十四卷。胡仔注重创新,前集卷四十九引陆机“谢朝花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句、韩愈“惟陈言之务去”语,强调“此乃为文之要”,“若循习陈言,规摹旧作,不能变化,自出新意,亦何以名家?”

胡仔专长于以史传证诗,前集卷十一曰:“余读史传及旧闻于知识间,得少陵诗事甚多,皆王原叔所不注者。”以下连举二十一条,援据《穆天子传》、《西京杂记》、《传灯录》、《荆州图记》、《楚辞》、《张九龄家传》、《西京赋》、《西

阳杂俎》、《水经》、《扬雄传》、《旧唐书》、《上林赋》、《成都记》、《六韬》、《颜氏家训》、《风俗通》、《襄阳耆旧传》、《李太白墓碑》，涉猎博而又“杂”，为一例。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九十五《诗人玉屑》条评论：“宋人喜为诗话，裒集成编者至多，传于今者，惟阮阅《诗话总龟》、蔡正孙《诗林广记》、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及庆之是编，卷帙为富。然‘总龟’芜杂，广记挂漏，均不及胡、魏两家之书。仔书作于高宗时，所录北宋人语为多；庆之书作于度宗时，所录南宋人语较备。二书相辅，宋人论诗之概，亦略具矣。”同卷“丛话”条又评：《诗总》“多录杂事，颇近小说。此则论文考义者居多，去取较为谨严。阅书分类编辑，多立门目。此则惟以作者时代为先后，能成家者列其名，琐闻轶句则或附录之，或类聚之，体例亦较为明晰。阅书惟采摭旧闻，无所考正。此则多附辨证之语，尤足以资考订。故阅书不甚见重于世，而此书则诸家援据，多所取资焉”。方回“渔隐丛话考”以为：“吾州罗任臣毅卿所病者，元任纪其自作之诗不甚佳耳。其以历代诗人为先后，于诸家诗话有去有取，间断以己意，视《皇朝类苑》中概而并书者，岂不为优。”《四库全书总目》评议方回：“虽乡曲之言，要亦不失公论也。”今天看来，均属公允。

胡玉缙先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卷五十九，在充分肯定“丛话”“摭拾繁富，所引蔡宽夫、王直方、潘子真、洪驹父诸家诗话，今已失传，所附考证，亦多明确”，“所引各书，残膏剩馥，足溉后人，实为诗话中善本”的同时，一口气指出“丛话”有采集犹略、考订犹疏、不知转声、辨所不当辨、当辨而不辨等十条可议之处，是迄今读“丛话”最细致的学者。

四

“丛话”的宋刻本传到今天，前集不存，仅存后集，共有两部，却非同版，分藏于北京大学和日本京都大谷大学。

北京大学藏《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四十卷，是后集的初刻本。存卷一至二、五至四十，书号□9082。版刻尚存北宋遗韵，写刻纸墨都很讲究，堪称南宋初年越州刻本的代表，海内孤本。

展卷为“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叙”，落款“丁亥（乾道三年）中秋日苕溪渔隐胡仔元任叙”；次为“苕溪渔隐丛话后集目录”；卷端题“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第一/苕溪渔隐胡仔元任编次”；卷四十末题“从政郎充绍兴府府学教授林思齐校勘/从政郎充两浙东路提点刑狱司准备差遣卢希度校勘/从政郎充两浙东路提点刑狱司干办公事魏熊梦校勘/文林郎充两浙东路提点刑狱司检法官徐森校勘/弟朝散郎直秘阁两浙东路提点刑狱公事胡仰”。半叶十一行，行二十二字，白口，左右双阑。刻工有许中、顾宥、李昌、陈明、陈仁、王悦、徐颜、徐正、毛昌、毛奇、毛璋。

傅增湘先生1943年作“宋刊《苕溪渔隐丛话》后集跋”，鉴定是书“字体

方严,多仿欧体,刻工精整,犹是南宋初浙杭风范”,“宋讳缺末笔,‘构’字注‘太上御名’,知为乾道、淳熙间所刻也”(《藏园群书题记》卷二十,中华书局1990年版)。今考乾道、淳熙之间共二十五年,《会稽续志》卷二“提刑题名”载:“胡仰,淳熙元年十一月以朝散大夫、直秘阁到任,淳熙二年三月罢任。”则胡仰任两浙东路提点刑狱公事仅五个月,是书为南宋淳熙二年(1175)胡仰两浙东路提点刑狱司刻本。

清初是书藏徐乾学传是楼,钤“徐乾学”、“健庵”印,《传是楼宋元板书目》著录。汪琬《尧峰文钞》卷二三载,传是楼在乾学居所之后,凡七楹间,以七十二木橱贮书若干万卷。传说楼于康熙中期不慎失火,楼书化为灰烬,光绪间徐氏后人徐衡谓当年幸存书二十余种。不过今存传是遗珍尚多,传说或许不确,此书能传到今天,使人倍感欣幸。

钤印还有“固始张氏鉴藏金石图书之印”,以及“李盛铎印”、“木斋”、“木斋读过”、“木斋审定”、“木斋审定善本”、“木斋审定秘笈”、“木斋秘玩”、“木斋宋元秘笈”、“德化李氏凡将阁珍藏”、“木犀轩藏书”等。李盛铎先生自述:“是书于壬寅(光绪二十八年,1902)春日向厂肆谭估买得前二十卷,后闻张少玉前辈仁黼亦从他估得后二十卷。甲寅(1914)秋日少玉之子孝彬玮知此书源委,欣然口赠。书此以志友朋高谊,且为后人知延津剑合之因缘也。第三、四二卷当日为谭估抽去,不知落何所矣。”(《木犀轩藏书题记及书录》,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傅增湘先生师事盛铎先生,撰“宋刊《苕溪渔隐丛话》后集跋”谓:“此书自光绪中叶有人携之入京,为张劭予侍郎所得。”“其后经王贾之手,辗转归于天津王懿孙家。”“何年丈秋辇时任直隶廉访司,偶见是书,惊为罕秘。”“其后何丈紆尊往还,意气颇洽,乃以殿本《九通》得之。”“何丈歿后,其嗣鬯威同年不能守,乃为德化李木斋师所获,鬯威固木师之女婿也。”两说不一,从中可见清末民国初年宋版书流传曲折之一斑。

是书于1939年随李盛铎先生木犀轩藏书一起归入北京大学。傅增湘先生从北京大学借观后再跋:“前岁吾师藏书数十万卷举而尽归北京大学,惟此书与他宋本十数部质于南中,迟迟未至。昨岁闻已北来,残腊乃从校中假得,从事校正,平生愿望,幸而得偿。”

大谷大学藏《渔隐丛话》后集四十卷,中国学者了解不多。是本晚于胡仰初刻本,最可惜的是缺失卷一至六,因而也就缺少了原本可能有的序言和目录等宝贵资料。卷端题“渔隐丛话后集卷第七”。半叶十三行,行二十一字。宋讳玄、匡、殷、恒、贞、徵、桓、敦均缺笔。

是书为日本周防国清寺的旧藏,钤“香山常住”长方墨印,后归关西神田香岩先生的容安轩。香岩先生之孙神田喜一郎先生,号鬯庵,是京都大学教授、著名汉学家,继承和发展了容安轩藏书,1984年过世,次年家属将是书及另外一万餘册藏书捐赠大谷大学。

神田家和大谷大学以避讳字为主要依据,鉴定是书刻于光宗朝之后,定为

南宋末刻本。因为一时无缘目验原书,仅从复制件上看,是书写刻欠精,翻刻时间当不早于南宋之末。然而从是书的版刻特征、大量的简写字、及元刻本亦存宋讳缺笔现象来看,时代再晚一点,也有可能。

是书文字与胡仰初刻本不尽一致,如卷三十七增加了《东皋杂录》之“涟水承天寺……”条,和《僧宝传》之“言法华者……”条。又如卷三十八“《复斋漫录》云:《异闻集》载沈既济作《枕中记》云:开元中道者吕翁,非洞宾也”条,在“吕翁”与“非洞宾”之间,阙少了“经邯郸道上邸舍中,以囊中枕借卢生睡事,此之吕翁”一段。再如卷四十末“《许彦周诗话》云:作诗押韵是一巧。中秋月夜诗押尖字,数首之后,一妇人云:蚌胎光透壳,犀角晕盈尖”。至此而止,后阙“又记:人作七夕诗,押尼字,众人竟和无成诗者。仆时不曾赋,后因读藏经,呼喜鹊为乌尼,因知读书不厌多”一段。增加自属有意,阙少也不像是疏忽,所以是书不是简单翻刻胡仰初刻本,而是增删改动初刻本内容之后再刻的新本子。

书末未翻刻胡仰等五人衔名,因为不是原样翻刻,可以理解。然而书题名“渔隐丛话”,删去了胡仰初刻本题名中的“苕溪”二字,推断其缘由,应该是为了与前集的初刻本及可能有的其后翻刻本的题名相一致,而前集初刻本的题名应该是“渔隐丛话”,同时翻刻的底本还应该是合前、后集为一体的抄本或刻本。那么是书究竟是仅翻刻后集的本子?还是合刻了前、后集,又在流传中失去了前集,仅存后集的本子呢?不宜悬揣,有待新证。

是书与胡仰初刻本之间,还有其他刻本,改动初刻本的内容也有渊源和继承,今存的后代版本中尚存今已失传的其他宋刻本的痕迹,容后叙。

历史上关于“丛话”宋代版本的著录和记载有:

一、陈振孙(1191-1261)晚胡仔八十年,是同乡大藏书家。《齐东野语》云:“近年惟直斋陈氏书最多,盖尝仕于莆,传录夹漈郑氏、方氏、林氏旧书,至五万一千八百十馀卷。”振孙晚年撰《直斋书录解题》著录:“《渔隐丛话》前集六十卷后集四十卷,新安胡仔元任撰。”今存“丛话”各版本,未见以“新安胡仔元任撰”署端者,原书是抄本的可能性大。

二、方回的时代在宋末元初,所撰“渔隐丛话考”云:“回幼好之。先君所藏川本,在先八叔父元圭家。回师也,昼夕窃观,学诗实自此始。后又求麻沙本观之,一再亡,一再买,不一本矣。”所记四川、建阳刻本之外,一再亡一再买的,或许都是刻本。

今天关于“丛话”宋刻本的著录和记载有:

一、国家图书馆藏《渔隐丛话》前集,存卷十五至四十五,书号5760,作宋刻本。《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①、《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②、《中国古籍善

①中华书局,1959年版。

②书目文献出版社,1980年版。

本书目》^①、《中华再造善本》工程影印线装本^②俱同。

二、《日本藏宋人文集善本钩沉》^③记载：日本关西神田家藏“丛话”宋刊本，卷中有神田香岩校记数纸。前集每半叶十三行，每行二十三字，仅存一册，题“渔隐丛话前集（阳文）”。后集每半叶十三行，每行二十一字，残存三十四卷，缺卷一至六，版心鱼尾下标“诗后几”，中间有宋人补写几则。

上面提到的关西神田家，即前述神田香岩、神田喜一郎先生家。提到的宋刻后集，早已归入大谷大学，亦前述。而提到的宋刻前集，则早已归入日本奈良的天理大学。神田家与天理大学均作宋刻本。

目前“丛话”版本研究的最大期盼，就是发现前集的宋刻本，故国家图书馆和天理大学的著录，倍受海内外关注。然而今检国家图书馆和天理大学两藏本，均非宋刻本，而是北京大学藏元翠岩精舍刻本的复本。两书均失牌记，此前的鉴定失误。

196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苕溪渔隐丛话》整理本，“校点后记”：“北京图书馆藏残宋本（耘经楼所依本），北京大学藏残宋本（此另一宋本），由于这两种宋本，一残存前集，一残存后集，不相混淆，今都称为宋本。及元翠岩精舍校订鼎新重刊本，今称元本。”以上述国家图书馆藏本与北京大学藏元翠岩精舍本比对校勘，竟未察觉两书同版，校记混淆宋元，使人遗憾。

五

“丛话”的元刻本，存世情况与宋刻本相反，没有后集，只有前集，一共三部，都是元翠岩精舍刻本，均不全，分存于北京大学、国家图书馆和天理大学。

北京大学藏《渔隐丛话》前集六十卷，元翠岩精舍刻本，存卷一至五十，在三家收藏中存卷最多，书号□9081，也是李盛铎先生木犀轩旧藏。书前冠序，无标题，落款“戊辰三月上巳日苕溪渔隐胡仔序”。序后牌记“翠岩精舍校定鼎新重刊”。目录至卷五十止，卷五十一至六十在印刷之前被从书版上挖去，但卷五十一的“后山先生、晁无咎”几字漏挖，留下马脚。卷端题“渔隐丛话卷第一前集/苕溪渔隐胡仔纂集”，“前集”两字以墨围作白文。半叶十三行，行二十一至二十三字，白口，左右双阑，无刻工。

是书原藏日本，有朱笔训点，钐“総政堂藏书记”印。传回中国后，傅增湘先生于1919年购得，手跋于书末：“此刻余生平未见第二本，即近时诸藏家书目亦未著录，可云罕秘矣。惟末十卷缺佚，惜哉。四月朔沅叔再志”。1943年元月作“宋刊《苕溪渔隐丛话》后集跋”云：“己未冬，厂贾以元翠岩精舍本来售，

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②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版。

③杭州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余议定以八百金得之。师（李盛铎先生）闻之，见语曰‘吾藏有宋刊后集，今翠岩本正是前集，若并储一匣，使成宋元合璧本，亦大佳事。’余以义不可却，不得已留校一通，割爱以奉焉。”

国家图书馆藏《渔隐丛话》前集，书号 5760，与北京大学藏本同版，误作宋刻本，已如前述。存卷十五至卷四十五，较北京大学藏本少十九卷。

书前之“苕溪渔隐丛话前集目录”系抄补，首叶钤“宋本”印。卷一至十四亦系抄补，卷十五端刻“渔隐丛话卷第十五 前集”。卷十六原刻首叶缺，卷四十一间有抄补。抄补以明代抄本为底本，抄补部分手跋：“闻昔海盐陈氏以百金购此书，其癖好之乃尔。予是集虽不全，倘遇陈氏其人，能不什袭藏之乎。甲寅春三月十日梅滨主人度笔。”钤“梅滨居士”印。梅滨乃清人丁清度之号，甲寅为咸丰四年（1854）。所谓海盐陈氏，当指陈鱣。台北中央图书馆今藏《渔隐丛话》前集六十卷十六册之十行二十一字乌丝栏抄本，即是陈鱣的旧藏。

天理大学藏《渔隐丛话》前集，系神田喜一郎先生容安轩旧藏，亦与北京大学藏本同版，误作宋刻本，为《日本藏宋人文集善本钩沉》抄录，前亦述及。是书未与后集同入大谷大学，而是另归天理大学，仅存卷三十一至五十，较北京大学藏本少三十卷，缺卷以近世抄本补配。

综合以上三部书，颇有值得注意之处：

一、翠岩精舍是元代建安著名书坊刘君佐及其后代的坊名。刘君佐字世英，号翠岩，翠岩精舍在建东阳。有说当地存《贞房刘氏宗谱》，君佐为十四世，始祖为京兆万年人刘翱，南宋书坊刘仲吉、刘将士、刘叔刚等系其族人。也有说刘君佐为淳熙间刘叔刚玄孙，刘叔刚名中正，以字行，坊名一经堂。

考元泰定四年（1327）刘君佐翠岩精舍曾刻胡一桂撰《朱子诗传纂集大成》于建安，揭佑民序云：“胡氏之心，岂弗良苦。观其精力兹书，殁身乃已。后十馀年，始得今刘氏君佐，朱子故友刘用之后人，大不忍以用朱子之学者埋郁不售，亟侵诸梓，使学者诚能于此沉浸参酌，举疏而传通，举博而疏通，明经取青紫之士，其事业所得，烛照龟卜，较然甚明也。”落款“时泰定第四强圉单阏岁长至穀旦乙丑后学从仕郎邵武路总管府经历致仕盱江揭佑民从年父书于建东阳翠岩刘氏家塾”。刘君佐告白：“文场取士，诗以朱子集传为主，明经也。新安胡氏编入附录纂疏，羽翼朱传也。增以浚仪王内翰韩鲁齐三家诗考，求无遗也。今以诗考谨侵诸梓，附于集传之后，合而行之。学诗之士潜心披玩，蜚英声于场屋间者，当自此得之。时泰定丁卯日长至后学建安刘君佐谨识。”揭佑民当刘君佐面称“刘氏君佐乃朱子故友刘用之后人”，应当可信。刘用行实不详，既为朱子故友，想系建阳当地的读书人，未知《贞房刘氏宗谱》录有其名否？

二、“丛话”前、后集的初刻本，均是单刻单行。后集卷三十五谓：“余于‘丛话’前集云：‘郑兵部仲贤、郑工部文宝，不知其果一人邪？果二人邪？’今观欧阳永叔诗话云：‘郑工部文宝于张仆射园，吟诗一联，最为警绝，云：水暖凫鹭行哺子，溪深桃李卧开花。’蔡宽夫诗话云：‘郑兵部仲贤，欧阳文忠公称其

张仆射园中一联,以为集中少比。即前一联是也。’以此考之,则文宝、仲贤,盖是一人名与字耳。但工部兵部之称不同,《西清诗话》云:‘缙山王子晋祠诗,是郑工部文宝题。’则工部之称,与欧公同,但蔡宽夫误作兵部耳。余又于前集云:‘夷季幼盘,或谢迈之字乎?’比见临川谢幼盘文集,方知幼盘是谢迈之字,无逸之弟也。其谢夷季却自别是一人。”后集卷三十九又谓:“先君尝云‘古诗词有绛都春……’,余于前集,误以古诗词为柳词,今正是之。”在后集中纠正前集之误,是前集已经单行,不及追改之故。

三、翠岩精舍所刻前集卷端题“渔隐丛话卷第一 / 苕溪渔隐胡仔纂集”,应当是前集宋代初刻本的原貌。

四、牌记称“翠岩精舍校定鼎新重刊”,说明底本是刻本,版是经过校定,有所修改和变动后的翻刻。

五、翠岩精舍刻本目录下还刊有一篇告白:“车书一家,文风鼎盛。经史诸集,焕然一新。至于诗家评话,刊行尤多。惟《渔隐丛话》是又集诗家之大成者,尚此缺焉。元来善本,已有舛误,况板经九十余年,讹脱尤甚。今本堂广求古今文集,补讹订舛,重新绣梓,庶可备牙签三万轴之储,锦囊三千首之助。高山流水,必有赏音。六一堂拜白。”则翠岩精舍翻刻的底本,是六一堂刻本。

六一堂堂号出典于欧阳修,“六一居士传”云:“居士初谪滁州,自号醉翁,既老而衰且病,将退休于颍水之上,则又更号六一居士。客有问曰:六一何谓也?居士曰:吾家藏书一万卷,集录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而尝置酒一壶。客曰:是为五一尔,奈何?居士曰:以吾一翁,老于此五物之间,是岂不为六一乎!”欧阳修卒于北宋熙宁五年(1072),六一堂当出其后,然而原委无考,从坊主告白看,文墨不若刘君佐。

六、翠岩精舍本中以小字注异文。如前集卷四“西清诗话”条中“尔从山中来”句下,小注“一作南山来”。六一堂告白既云“广求古今文集;补讹订舛,重新绣梓”,则当时曾以两种以上底本对勘。

七、翠岩精舍本卷端题“渔隐丛话卷第一”,之下以墨围刻白文“前集”,则当有后集,是前、后集合刻的本子。那么,其底本六一堂本也应该是前、后集合刻的本子。

八、六一堂本刊刻于何时?迄今未见六一堂其他刻本,考其告白云“元来善本,已有舛误,况板经九十余年,讹脱尤甚”,而“丛话”后集初刻在淳熙二年,九十年后为咸淳元年(1265),距元军攻破临安还有十一年。六一堂本的大致刊刻时间,应该在南宋灭亡之前至元代初年之间。

九、翠岩精舍本刊刻于何时?检其版刻具有刘君佐翠岩精舍元代中期的风格,当刻于元泰定末年之前。李盛铎先生谓是书“宋讳匡、戊、敬等字有缺笔,殆宋末元初所刻”(《木犀轩藏书题记及书录》),年代判断稍早。

十、北京大学、国家图书馆和天理大学所藏的翠岩精舍刻前集本,均无卷五十以后部分。推断当年刷印的时候,前集卷五十一至卷六十和后集四十卷的

版片已经毁坏,未能补充,因而仅刷印前集的前五十卷,并挖改目录,冒充前集全本行世。上述三部复本分散流传到了今天。

六

见闻所及,明代没有“丛话”的刊刻本。惟日本《汉籍分类目录集部东洋文库之部》记载,东洋文库藏明刻本前集六十卷后集四十卷八册,函架番号4-6-29,是小田切万寿之助旧藏,切盼有缘目验。

今传“丛话”的明抄本有八部以上:

一、国家图书馆藏明嘉靖七年(1528)徐梁抄本,称《渔隐丛话》,前集六十卷后集四十卷,书末题:嘉靖七年孟春底本录至季春十三日至四月望日完南州徐梁。

二、国家图书馆藏明抄本,称《渔隐丛话》,存后集卷一至十六。

三、北京大学藏明抄本,称《渔隐丛话》,前集六十卷后集四十卷,缺前集卷九、十、十一。书末抄“明弘治戊午岁(十一年,1498)七月六日僧善辂阅一过”,钐“宝德堂藏书”朱文长方印。顺便说,上海图书馆藏清抄本,称《渔隐丛话》,前集六十卷后集四十卷,内容与北京大学藏本一致,也抄有“僧善辂阅一过”题记。两书均为弘治僧善辂阅本的传抄本。

四、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明抄本,称《渔隐丛话》,前集存卷一至二十,三十一至六十,后集存卷一至七,三十至三十六。

五、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明按察司书吏唐天桂誊写本,是大内景阳宫旧藏,称《苕溪渔隐丛话》,存前集卷六至三十五,四十一至五十五,后集卷六至三十五,共七十五卷。蓝格,版心有“石林书屋”四字,卷末有“按察司书吏唐天桂誊写”一行。是傅增湘先生校阅过的三部明抄本之一。

六、原宋牧仲家藏明抄本,傅增湘先生校阅过的三部明抄本之一,《藏园群书经眼录》卷十九云:“旧写本,十行二十字,存前集一至二十,后集二十至四十。末有顾氏跋:‘隆庆辛未,有越贾持是书求售者,原脱二卷,而割补以给人。余觉其讹,辞去。后竟售于薛方山先生,乃得易宋元通鉴,凡八十本。则知编简之讹舛,虽宿学亦未遽辨也。万历初元冬,复有持是书求售者,见其次序井然,亟收之。后阅他书,而苕溪渔隐之说有不载是编者,岂其传录或加节略欤?未可知也。当求善本校而正之。此书坊间无刻版,亦不易得云。句吴顾飞卿识。’钐‘西陂’、‘宋牧仲图书印’、‘黄堂清暇’、‘书隐’、‘顾胡英印’、‘顾氏世雄’、‘竹垞藏本’、‘峨眉山人收藏图书之印’。己巳二月二十日自书估常姓借来一校。”不知飘坠谁家?

七、原徐梧生家藏明棉纸红格写本,傅增湘先生校阅过的三部明抄本之一,《藏园群书经眼录》卷十九云:“十行二十四字。卷中墨笔校改之处甚多,不知为何人笔也”。“此独百卷,完整如新,可贵也。”亦不知飘坠谁家?

八、日本江戸初期抄本,前集六十卷后集四十卷,摹写临川书堂刻本,今藏

日本公文书馆。

八部明抄本中,北京大学藏明抄本、上海图书馆藏清抄本的共同底本——弘治僧善辂阅本,和国家图书馆藏嘉靖徐梁抄本,值得重视:

一、弘治僧善辂阅本在明抄本中时间比较早。

二、弘治僧善辂阅本后集末抄有胡仰等五位校刻人衔名,后集内容在多数情况下也与胡仰初刻本一致,表明了后集与胡仰初刻本的关系。然而后集内容又有与胡仰初刻本不同之处,如卷三十二末增加“王符传”约二百字等,大谷大学藏宋刻后集无之,则僧善辂阅本另有比勘底本。

三、弘治僧善辂阅本前集内容与元翠岩精舍本也不尽一致,联系后集的情况,两集底本应出一源。

四、嘉靖徐梁抄本具有明确抄写年代,晚于弘治僧善辂阅本,内容上有弘治僧善辂阅本所无、而清代版本所有的内容,既承前启后,又表明与清代版本有共同的底本来源。

七

清代距离胡仔的时代已经久远,但是清代的“丛话”版本却有更大的疑问存在。

清乾隆六年(1741)杨佑启耘经楼刻前集六十卷后集四十卷本,是今存“丛话”的通行本,北京大学藏有五部。是书封面题“依宋本重雕 / 苕溪渔隐丛话 / 前集六十卷后集四十卷 耘经楼藏板”。冠“序渔隐诗评丛话前集”,落款“戊辰春三月上巳苕溪渔隐胡仔序”。序后刊:“绍兴甲寅(五年,1194)槐夏之月陈奉议刊于万卷堂。”次为“苕溪渔隐丛话前集目录”。卷端题:“渔隐丛话卷第一 前集/ 苕溪渔隐胡仔纂集”。后集冠“序渔隐诗评丛话后集”,落款“丁亥中秋日苕溪渔隐胡仔元任叙”。次为“苕溪渔隐丛话后集目录”。卷端题“渔隐丛话卷第一 后集/ 苕溪渔隐胡仔纂集”。前集半叶十三行二十一至二十二字,后集半叶十三行二十三字,白口,左右双阑。后集末刊跋文:“《渔隐丛话》,宋胡元任先生所编次也。……自有诗话以来,未有若斯编之详备者矣。……向时雅爱此书,但传抄者纰缪极多,近因购得宋刻,遂勘讎付枣。始于乾隆庚申(五年,1740)春仲,迄辛酉夏首而竣。其中尚有讹脱处,无从校补,未敢妄为增改,悉仍其书焉。海盐杨佑启芷庭氏跋。”

傅增湘先生在1919年之后的二十五年间,五次发表鉴定意见,最后意见见1943年作“宋刊《苕溪渔隐丛话》后集跋”:“此书近世通行者,只有海盐杨佑启耘经楼重雕宋本,号为佳刻。据乾隆辛酉杨氏后跋,称因购得宋刻,遂刊讎付枣云。以余观之,所云宋刻,不可尽信。考前集元任自叙之后接题‘绍兴甲寅槐夏之月陈奉议刊于万卷堂’一行,殊为可疑。宋代刻书,例加标识,谓之牌子。或在序后,或在目后,或刊首卷之尾,或附末卷之尾,虽款式有钟鼎碑旂之不一,字体有楷行篆隶之不同,然皆在版心空处,大字别占一二行,以示表异。断

无直接本文,且顶格楷书,与撰序人并列,混淆耳目者,其为伪造可知。且其标题‘绍兴甲寅’,尤为大谬。考胡氏两序,前集成于戊辰,为绍兴十八年。后集成于丁亥,为乾道二年。今万卷堂陈氏刊书乃题为甲寅,检年表,甲寅为绍兴四年,距前集告成尚早十四年,距后集更早三十三年,其书未属稿而预为刊布,宁非笑端。然则杨氏覆梓者究为何本乎?以余观之,其所得者为元代翠岩精舍本,估人去其牌子,而别加‘绍兴甲寅’一行,以充宋槧。杨氏贸贸然收之,又贸贸然刻之,流传百余年,人皆视为善本,于其作伪抵牾之迹,乃熟视而无睹,宁不大可叹喟也哉。……兹取宋刊后集与杨刻对勘,……第又不可解者数事,……凡此二本种种不同,必有所据,断非校勘有所变更也。余综合前后考之,此本(指宋刻后集)为胡仰在浙所刻家集,自属此书祖本。然其夺讹显然,不能为之讳。余意此后必经再刻,举初版之谬失而整齐订正之,而翠岩精舍即据以刊行,故今日举此祖本与翠岩本相校,多格格然不能相合,其为别有一宋刻断可知矣。惜时历四朝,年更八百,只留此祖本,而重刊之书已不可见,遂滋后人之疑虑耳。”

傅增湘先生探讨的是两个问题:第一、究竟有没有南宋陈奉议万卷堂刊本?耘经楼本翻刻的底本刊记是否伪造?第二、耘经楼本的翻刻底本是什么本子?是否元翠岩精舍刻本?

今考“绍兴甲寅陈奉议刊于万卷堂”刊记,除耘经楼本予以翻刻之外,还有三部现存清抄本也录有这一刊记:

一、国家图书馆藏清吕氏南阳讲习所抄本,书末题“御儿吕氏南阳讲习堂钞藏”,钤印“吕补忠印”、“无咎”,为吕留良第五子补忠所抄,先经王铤校勘题跋,后经莫伯骥五十万卷楼收藏,著录于《五十万卷楼群书跋文》,书号13341。在“序渔隐诗评丛话前集”之后,录有刊记“绍熙甲寅槐夏之月陈奉议刊于万卷堂”。

二、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清静深斋抄本,海源阁旧藏,书号□810.04/4721.1。在“序渔隐诗评丛话前集”之后,录有刊记“绍兴甲寅槐夏之月陈奉议刊于万卷堂”。此书不避雍正以后诸讳,应为清康熙抄本,时代与吕补忠本同时。

三、上海图书馆藏清抄本,黄裳先生来燕榭旧藏,书号821392-99。在“序渔隐诗评丛话前集”之后,录有刊记“绍熙甲寅槐夏之月陈奉议刊于万卷堂”。

以上三个抄本的存世,及吕补忠抄本、静深斋抄本早于耘经楼本,可以证明:

一、确实有宋绍熙五年陈奉议万卷堂刻本,时间早于大谷大学藏宋本,更早于六一堂本,今已不传。陈奉议刊于万卷堂的刊记,是真实记录,不是估人冒充宋槧的伪造。

二、耘经楼本翻刻底本刊记中的绍兴,确为绍熙之误。康熙静深斋抄本非自耘经楼本出,却也犯了同样的错误。

三、陈奉议当系陈姓奉议郎,奉议郎自南宋神宗元丰后复置,元无之,常于

书坊刻本中见到刻书者用于自称,如婺州市门巷唐奉议宅等。

耘经楼本、吕补忠本、上图藏本、静深斋本虽然都录有宋绍熙陈奉议万卷堂刻本的刊记,但是内容并不全同。吕补忠本、上图藏本、静深斋本内容基本一致,反映了万卷堂本的情况:

一、万卷堂本题名在序言、目录等处称“苕溪渔隐诗评丛话”。

二、万卷堂本的内容,与南宋胡仰刻后集本、元翠岩精舍刻前集本、明弘治僧善辂阅本都有距离,与明嘉靖徐梁抄本却有接近之处。如前集卷三十九《冷斋夜话》“东坡自海南还……”条,吕补忠本、上图藏本、静深斋本和徐梁抄本共同增加“诗注云:丛林乃禅门之称……”一百七十字,他本无之。不仅可以补充对于“丛话”南宋刻本演变的了解,也提示了徐梁抄本中不同内容的一个来源。

耘经楼本自称“依宋本重雕”,又有陈奉议万卷堂的刊记,是不是真的翻刻宋万卷堂本呢?

一、耘经楼本表现出了万卷堂本的若干特征,如翻刻有万卷堂本的刊记,序言、目录以“苕溪渔隐诗评丛话”为标题等等,似乎底本就是万卷堂本。

二、如果耘经楼本真是重雕万卷堂本,其内容应该与吕补忠本、上图藏本、静深斋本相同,然而耘经楼本的内容却与吕补忠本、上图藏本、静深斋本颇多不同。杨佑启跋文云:“近因购得宋刻,遂勘讎付枣。始于乾隆庚申春仲,迄辛酉夏首而竣。其中尚有讹脱处,无从校补,未敢妄为增改,悉仍其书焉。”好象是没做多大改动,实际上改动之处不少。换言之,耘经楼本的翻刻底本还有其他来源。前集的多数改动依据的是元翠岩精舍本,后集则有其他参考底本。

三、耘经楼本的版式不统一,前集版式与元翠岩精舍本相同,后集则不同。

四、耘经楼本有少数改动是自作主张,如前集卷一《吕氏童蒙训》“读古诗十九首……”条末句,各本为“自然下笔高妙”、“自然下笔有力”、“自然下笔成章”,耘经楼本独作“自然下笔不同”。后集卷四《六朝事迹》“谢安墩在半山……”条,各本作“梧桐识佳树,蕙草留芳根。地古云物在,台荒禾黍繁”。耘经楼本独在四句中间增加“白鹭映春洲,青龙见朝墩”二句。

五、综合上述,耘经楼本以元翠岩精舍刻前集本等其他版本校勘翻刻底本,尚属合理。然而前集版式为什么要模仿元翠岩精舍本,造成前后集版式不一致呢?再问,如果手上真的有宋绍熙陈奉议万卷堂刻本,翻刻前还要做那么多校补增改吗?更要回过头去问,将底本刊记之“绍熙”翻刻为“绍兴”,真的会马虎到如此地步吗?

今天看来,杨佑启所谓“近因购得宋刻”,恐怕并非宋刻,而是如同吕补忠本、上图藏本、静深斋本一样的万卷堂本的传抄本。因为不能完全相信抄本的内容,故作大量校勘,而以元翠岩精舍本为主要的校勘底本,以至照刻了翠岩精舍本的版式。同时,虽然翻刻了万卷堂本的刊记,但仍恐有误,而开卷首篇之前集序言的第一句,即为“绍兴丙辰”,或许造成了先入为主的印象,以至怀疑所抄刊记笔误,遂将“绍熙”谬改成了“绍兴”。

耘经楼本避讳仅至康熙朝,因此杨佑启所谓“始于乾隆庚申春仲,迄辛酉夏首而竣”,当系仅就刻书而言,底本的搜集、校勘和写样,大概是从康熙年就开始了,至乾隆开元后方付诸梓人而已。

附带说,清代另外还有五部以上的抄本、一部刻本和一部日本刻本存世。

《四库全书》本是重要的抄本。《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五著录“丛话”为江苏巡抚采进本,而《江苏省第一次书目》、《江苏省第二次书目》中均无“丛话”。倒是《两江第一次书目》中有《渔隐丛话》前后集八本,《浙江省第三次书目》中有《苕溪渔隐丛话》前后集八本,《江西巡抚海第四次呈送书目》中有《苕溪渔隐丛话》前后集十本,而且《浙江采集遗书总录》著录浙江呈送的是“刊本”。今天从内容上看,四库全书本与耘经楼本一致,底本应该就是浙江呈送的耘经楼刻本。

北京大学还藏有《四库全书》零种“丛话”本,存前集卷二十九至五十五,共七册,均以纸捻装订,书号□811.104/4727。各册前钤“古稀天子之宝”,后钤“乾隆御览之宝”。扉页黄笺题“详校官国子监助教臣延福”,册末题“总校官编修臣吴裕德、编修臣胡荣、校对监生臣蒋光弼。”与文渊阁本相较,略有改动,如前集卷五十五《石林诗话》“刘贡甫天资滑稽……”条,文渊阁本有“流 有余智”句,是本则作“流转有余智”。是本之身世,还有探讨的余地。

另外的刻本是《海山仙馆丛书》本,以耘经楼本为底本翻刻,但是缩小为巾箱本。封面题:“道光丙午镌/ 苕溪渔隐丛话/ 海山仙馆丛书”,半叶九行二十一字,黑口,左右双阑。编刻者潘仕成,字德畬,番禺人,道光间官兵部侍郎,后经营盐业致富,与伍崇曜、康有为、孔广陶并称粤省藏书四大家。室名海山仙馆,道光中仿《知不足斋丛书》,辑《海山仙馆丛书》五十六种,版片于禁烟之役中被法军劫至巴黎博物馆。

另外的日本刻本是明治二十七年(1894)刻近藤元粹训点本,今藏黑龙江大学,也值得注意。

胡仔的《苕溪渔隐丛话》一书,至今已历八百余年。由于为社会所需要,刻本抄本都不少,流传中间屡经改动,形成了复杂的版本现象。主要的版本特点,一是前集和后集的初刻,都是单刻单行,造成前、后集的原始版式差异,后代虽然历经合抄合刻,但是前、后集不同版式的痕迹,始终存在于后来的版本之中。二是宋元版本失传的是多数,保存下来的是少数,因而从源头上就有许多版本谜团难以廓清,许多判断无以举证。三是明抄本由于传承了宋元版本的若干面貌,所以具有特殊的价值。但是明抄本在传抄时往往参考不同的底本,兼以己意作校勘和修改,导致版本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四是历代反复传抄、翻刻的本子,多数都经过多种本子的校勘和修改,虽然从总体上说是大同小异,但小异的因果关系彼此交错,版本间的传承关系异常复杂。这些都是值得从中国古籍版本学研究的角度深入总结的。

作者工作单位:北京大学图书馆